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生成逻辑、 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

朱文琦,崔泽煊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358)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内外互构的鲜明世界性特征,并突出表现为“中国‘观’世界”与“世界‘观’中国”的双重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清晰的历史传承,在应对一系列世界文明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从何以可能、从何而来及因何呈现三方面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发现该思想既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世界性一脉相承,又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下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文化自强论、文化主体论、文明互鉴论和文明贡献论四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实践要求,应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形于中”而“发于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在文化开放中切实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实践指向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6) 08-0405-08

On the global dimens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ts generative logic, core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ZHU Wenqi, CUI Zexu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possesses a distinct global fea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and i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in the dual traits of "China perceiving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perceiving China". It possesse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is and a distinct historical inheritance, having taken shape and evolved while addressing a range of global civilizational challeng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global dimens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unfolded from three aspects: its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historical origins, and present manifestations. The thought not only carries forward the global vision inherent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found grasp of the laws govern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y the Communist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mid the intertwining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global dimens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mainly encompass four aspects: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elf-strengthening,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theory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al contribution.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global dimens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we must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ultivating strength

internally and exerting influence externally" to enhance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effectively safeguard China's cultural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opennes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global dimension; generative logic;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practical directions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论述文化问题,他们将文化的“世界性”纳入学术视野,并在世界历史理论中予以阐发,创立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含的“世界性”,本质上是“观”世界与世界“观”的有机统一。“‘观’世界”,是对理论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在“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1]35}中实现自身发展,并对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实践发挥推动作用;而“世界‘观’”,则是从外在世界的角度而言,鉴于包括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在内“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35},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样具有内外互构的鲜明世界性特征,并突出表现为“中国‘观’世界”与“世界‘观’中国”的双重特质。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主体性,明确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巩固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自觉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为中国在应对国际交往的不确定性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当前,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从直接研究成果来看,齐卫平等^[2]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黄进^[3]研究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世界文化繁荣和发展中国家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苗遂奇等^[4]则论证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丰富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意义。此外,也有学者聚焦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进行探讨,如徐艳玲^[5]提出作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映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向度主要是在文化开放的历史趋势与文化安全的战略考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总体而言,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理解侧重于从“世界‘观’中国”,集中探讨这一思想在当下世界场域中的天下情怀和责任担当。基于此,本文拟从中国“观”世界与世界“观”中国相统一的视

角出发,遵循理论与实践辩证互动规律,首先论证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生成逻辑,其次深入探讨其理论内涵、把握精髓要义,最终以理论观照现实、明确实践指向,力求为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探索。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生成逻辑

任何科学理论都不会偶然或凭空产生,而是在与其他诸多特定因素的联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既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世界性一脉相承,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下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一)何以可能: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演进脉络看,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阐释,首先应回归马克思的文本语境及其生成、发展的文化土壤。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在地包含着一条“世界性”线索。在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这一“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541}中,马克思从相对意义上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7]90},但更重要的是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衍生出的系统性冲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必然集聚起世界性的反对力量,人类社会终将跨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7]52}的文明形态,走向共产主义文明。就后者而言,中华先民以宇宙星象抽演出的“道”为终极依据思索万事万物,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梁启超指出:“我们所以能化合成恁么大的一个民族,很受这种世界主义政治论之赐。”^[8]历史上,“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9]因而,“大同世界”不仅是古人所憧憬的理想蓝图,更体现在无数仁人志士的政治实践中,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

以上论述,从侧面确证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某种交集,但能否促成二者发生“化学反应”,关键在于方法的选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生成得益

于“两个结合”。在新时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世界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着眼世界范围内各种主义思潮复杂多变、相互叠加的新态势,因应党和人民事业对文化强国建设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促进世界文明交流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进到新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世界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相结合,扎根中华文化沃土阐发党的文化主张。当人类文明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习近平多次在外交场合运用“结合”的方法创新阐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等价值理念,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又赋予中华文化“天下观”以更加开阔厚重的人类情怀。

(二)从何而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历史传承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追求始终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表现为文化理念与文化实践的辩证统一。1916年,李大钊号召中国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0]。1922年,党的二大讨论通过《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等,充分显示了党纵观世界变化、将中国革命与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高度思想自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提出并践行一系列旨在推进国际和平合作的政策主张,用实际行动塑造中国爱好和平、不畏强权、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大国形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国际格局加速演进的新情况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新特点,邓小平指出:“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标准,就是“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11]党领导人民顺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在世界大局中统筹推进各项事业,在提升整体实力的同时,为更多国家提供发展机会和实践参考。

历史深刻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12]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因势而谋,明确要求全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

面临的重大问题”^[13]。党团结带领人民守正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党的文化事业。作为党的文化理论最新篇章,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党的世界眼光、世界胸怀,主张不同文明应相互尊重、真诚相待,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大历史观,坚持胸怀天下的理论创新方法,用长远眼光审视历史发展脉络及前进方向,强调“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14]^[105],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三)因何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现实回应

衡量或评价一种理论是否科学,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应当承认,代表世界历史潮流的现代化首先发生于西欧,随后扩展至北美地区。在事实尺度上,西方现代化所开启的近代工业文明的确比前资本主义时代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在价值尺度上,资本主义血腥疯狂的海外殖民、单向度的增殖追求及其社会的全面异化,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1]^[690]。一直以来,广大亚非拉国家在西方建构的世界文明叙事中沦为“边缘地带”。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现代化先发优势推行文化霸权、鼓吹“文明偏见”,而非西方文明往往被视为异己的“他者”遭排挤或打压。反观现实,西方所竭力渲染的“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不仅无助于世界和平,反而使人类正经历着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实践的发展,呼唤一种更具时代性的先进文明观出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从外部看,和平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但“东升西降”的总体情势与“西强东弱”的当下境况并存,以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化思潮对各国文明交往带来负面影响^[15]。西方某些国家甚至以意识形态划线煽动“新冷战”,人为制造文明对立,因而对于“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问题需要作出科学回答。放眼国内,文化对我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定向导航作用尤为明显。如何担负好新时代文化使命,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文化强国建设筑牢制度基础和体制保障,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然面对且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党中央统筹研判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变化,深刻认识到

“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16],进而把“两个大局”作为谋划文化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强化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推进文化创新创造,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大厦深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之中,进一步强化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整体性、针对性和预见性。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理论内涵

文化生成于具体的历史实践之中,并以多样化的方式描绘着文化创造主体所处的时空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7]从“中国‘观’世界”及“世界‘观’中国”的理论侧重点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文化自强论、文化主体论、文明互鉴论和文明贡献论四个方面。

(一)文化自强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近代以前,中国整体国力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世所公认。但1840年以来,“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18]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文化的世界性维度愈发显现。自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多方寻求救国道路。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的曲折探索,表明封建制度已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也倒映出彼时国人文化不自信甚至是文化自卑的心态。从严复所言“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名],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高呼“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并将文化救亡作为民族救亡的根本,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时人沉重的文化危机感^[19]。

对中华文化采取何种态度,既是一种价值立场,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实践课题。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并指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20]。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基于历史视角创造性地阐释了“文化自觉”,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21],而且把文运与国运更加密切地关联起来,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根据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

大问题”^[22]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并非终点,要从理性全面的内省认知迈向更为主动的文化创造和实力提升,则必须实现文化自强。在新的起点上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23]。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中,“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构成一条逻辑链。其中,文化自信是中介环节,它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以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战略目标,三者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又相对区别、层层递进,共同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将文化体认与价值建构相贯通的知行统一观。

(二)文化主体论: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赓续中华文脉

在人类思想史上,“主体性”是中西方哲学家共同关注的理论话题。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论述,深刻塑造了中国哲学走向,并在陆王心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对主体性问题进行反思,中世纪“上帝”取代“人”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西方近代哲学则更加关注富有现代气息的主体性问题^[24]。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汲取前人主体性哲学思想的有益成分,批判了唯心主义者的根本错误,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⁴⁹⁹的思想偏颇,阐明了基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将“主体性”从抽象的思辨中解放出来。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其所强调的主体性,同样建构在科学实践原则之上,使新时代中国文化实践具有更为宏阔的历史纵深,为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赓续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阐述了文化主体性缘何必要。世界大国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主体性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深厚滋养和恒久支撑。习近平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5]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实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确立文化主体性,能够将文化认知建构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筑牢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根基,在文化创新创造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更为积极的主体姿态。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党领导人民确立和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曾遭遇危机。中国共产党诞生,才使中国人

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也由此得以深刻重塑。“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25]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阐述了如何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领导力量、思想保证、制度支撑、原则遵循等多方面对文化建设进行部署,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夯实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互动机理,并赋予党以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持续释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三)文明互鉴论:在文明相互借鉴中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文化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具体内容也因各民族、国家发展路径的差异而多姿多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540-541}因而,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包括文明在内的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正因不同文明存在差异性和独特性,才为不同文明在开放交流中取长补短、实现自我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文明交流互鉴筑就了扎实根基与广阔空间。2025年7月,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发表的《“我们的文明观”全球民意调查蓝皮书》显示,全球文明倡议获得受访者高度认同,90.8%的受访者同意“尊重多样性是国际社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91.8%的受访者同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应主要是合作而非对抗”^[26]。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择其要者而言:一是明确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自主创造的原生性文明,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任何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文明,都不可能是封闭僵化的产物。中华文明从历史深处走来,在与其他异质文明的交融中丰富完善。习近平多次强调历史思维,主张总结历史经验、揭示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的演讲中,他概括回顾中国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中外文明学习、消化、融合、创新的交流互鉴史,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27]。二是阐明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意义。“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7]“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8]5}客观上,不同类型的文明固然存在个性差异,但这绝非文明隔阂、文明冲突产生的根源。正是因为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各国人民才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精彩图谱,才合力推动着世界和平与发展。三是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深化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阐明了中国主张。在此基础上,2025年9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展开,具有清晰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针对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担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了战略支撑,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人类正确一边,与世界人民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坚定决心。

(四)文明贡献论: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阐述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28]9}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以翔实的史料及考古发现,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渊源流变,展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历程及其重要作用^[29]。西方诸多思想家也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马克思在论及中国时曾谈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30]

在通约意义上,中华文明可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大形态,即中华文明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习近平指出,经由“结合”,“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

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25]。进一步说,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党领导人民在探索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坚实支撑,是有别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型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断,本质上是对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世界意义的思考与回应。对此,习近平主要从三方面作出阐释: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31]。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与生态观,呈现出人类文明变迁的崭新图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等成功举办,进一步传递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文明作贡献的坚定立场。相关数据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融媒体定制化服务平台已吸引120多家阿拉伯媒体入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为阿拉伯国家举办20多期媒体培训班,培训700多人次,其中多是青年人^[32]。新时代的中国以一系列融汇古今且连接中外的新论断、新实践深化与其他国家文明对话,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球治理新变革中分享中国理念、诠释大国担当,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实践指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性在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互动中孕育形塑,同时表现出鲜明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所具有的双重特质,决定了我们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也应把握好“中国‘观’世界”与“世界‘观’中国”的辩证统一,更好地统筹内外发展,为实现民族复兴接续奋斗。

(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文化发展道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业前进方向和兴衰成败。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是传承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浓缩了中国古代先贤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其所承载的社会理想、治理思想、生态理念、交往之道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也能

为破解人类共同的现代化难题提供借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推动传承中华文脉、赓续文明基因;党的十九大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写入党章的根本大法。今后一个时期,要下大力气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马克思主义激活其生命力,根据条件变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实践需要破旧立新、温故知新、返本开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和丰富形式。

二是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革命文化集中反映着党的政治本色和使命追求,是党和人民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据统计,全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全国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471个革命遗址、纪念馆场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革命文物发挥的教育功能持续显现^[33]。要依托我国丰厚的革命文化资源,重点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故事,讲好党和人民团结一心、不惧强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展示中国维护世界安全稳定、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态度。

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党领导人民探索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形成并持续发展,它昭示社会主义性质、体现最广大人民文化利益、指引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相继出台并全面实施,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筑牢坚实支撑。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性实践和成功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贯穿文化建设始终,在提升中国美誉度、弘扬中国精神上创新突破,为实现民族复兴注入强大思想力量。

(二)坚持“形于中”而“发于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上升到新的政治高度。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坚持“形于中”而“发于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应重点把握三对辩证关系:一是“软”与“硬”的关系。硬实力增强并不必然带来软实力提升,因而不能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

要客观分析当前中国形象“他塑”、国际话语权仍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的原因,系统增强捍卫国家利益的硬实力,这是基本前提。舍此,软实力也难以继。同时,要努力创新传播理念,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中国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向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

二是“借力”与“发力”的关系。所谓“借力”,是指充分依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政府、社会机构主办的外事活动,向世界推介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成功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谓“发力”,是指加强议程设置能力建设,办好中国自己的主场外交,主动发声,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借力”与“发力”应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形成合力。近年来,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等国际平台,立足 G20 杭州峰会、世界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等主场外交,中国积极主动发声,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是“和”与“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各国应以和为贵、美美与共。但在现实中,国际舆论斗争从未停止,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分化西化图谋也没有停歇。为此,既要继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中国“朋友圈”,又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统合线上与线下、传统媒体与数智媒体力量传递中国声音,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有力维护好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

(三)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历经站起来、富起来的赓续奋斗,中华民族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民族复兴势不可挡。新时代中国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是在实践探索上,党的百年奋斗深刻改变了中国发展格局,证明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绝非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破除了现代化道路只能定于一尊的错误认知,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新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改变了中国自己的发展,它同时也改变了发展中世界的现代化进程。”^[34]党领导人民推进五大文明建设、把握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宝贵经验,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完全统一,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为其他国家政党带领人民探

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借鉴参考。

二是在理论创新上,“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22]¹⁵ 习近平文化思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仅从一般意义对人类关于人文教化、文化交流、文明共生的理念作出新阐发,而且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仅回应了各国文化现代化的诸多共性问题,而且包含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等一系列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理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

三是在平台建设上,中国始终将本国发展置于人类文明坐标系中,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建立健全制度化文明对话渠道,完善文明传承创新与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党交往、民间交流及跨国人才培养在文明沟通中的重要作用。2024年6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充分表明新时代中国方案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四)在文化开放中切实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是社会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时专门强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十五五”规划就“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35]作出安排,统筹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也是题中之义。在文化开放中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是坚持自信包容。自信,是一种积极理性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25]。包容,就是要“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14]⁴⁸。坚持自信包容,最根本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托当代中国实践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营养,提出新观点、总结新经验、构建新理论,以中国之理阐释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不断巩固好中华文化主体性,确保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二是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近年来,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冲击。为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持续完善并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巩固好全党全社会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是着力维护好网络文化安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络互动的即时性、网络信息的裂变性使网络文化安全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因此,要坚持党管网络、党管媒体原则,认真研究全媒体生产传播及网络运行规律,创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培养专兼结合的网络管理人才队伍,最大程度规避网络文化风险,把互联网建成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凝聚社会共识、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的主阵地。

四、结 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新篇,其世界性特征并非单一向度的话语陈述。基于“生成论—本体论—实践论”分析框架,立足“中国‘观’世界”与“世界‘观’中国”的双重维度,构建起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理论图景,明确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情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理论、历史与现实逻辑的内在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自强论、文化主体论等四大方面为理论支撑,既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文化发展的理论贡献、思想指引,也为中国以世界视野审视自身文化,进而在世界交往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指明了实践路径。未来,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性的学理阐释,也可从政党交流合作、全球治理等交叉领域展开,为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作出新探索。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齐卫平,马海磊. 世界眼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显著特征[J]. 江汉论坛,2024(9):5-11.

[3] 黄进.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及世界意义[J]. 世界哲学,2025(1):16-26.

[4] 苗遂奇,郭慧,赵瑞熙.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价值和世界意义[J]. 党建,2023(11):33-36.

[5] 徐艳玲.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向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5):12-21.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49.

[9] 艾思奇. 艾思奇全书: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83.

[10]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2.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25.

[12] 本刊编辑部.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J]. 求是,2020(2):12-20.

[13]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2.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

[15] 邹广文. 巩固文化主体性应警惕的几种文化思潮[N]. 光明日报,2025-05-23(06).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牢记初心使命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J]. 求是,2024(13):24-29.

[17]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 求是,2021(1):4-13.

[1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5.

[19] 郑师渠. 近代知识阶级新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95.

[20] 费孝通.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 学术研究,2003(7):5-9.

[21]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

[22]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3] 习近平.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 求是,2025(8):4-8.

[24] 邹广文.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25(2):4-20.

[2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26] 刘玲玲,李欣怡,龚鸣,等. 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举行:凝聚文明共识 共促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2025-07-12(03).

[27] 习近平.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J]. 求是,2019(9):4-10.

[28]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9] 王巍,赵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J]. 中国史研究,2022(4):5-32.

[3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0.

[31] 习近平.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J]. 求是,2025(1):4-19.

[32] 苗春. 山海相通 光影共谱文明乐章(深观察):记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11-14(07).

[33] 徐欣馨. 国新办发布会:全国年均举办革命、建设、改革主题展览超过3000个,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EB/OL]. (2025-09-10)[2026-04-03]. https://www.ctnews.com.cn/jujiao/content/2025-09/10/content_178415.html.

[34] 任仲平. 引领未来,中国做对了什么[N]. 人民日报,2025-10-20(01).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2026-03-14(01).